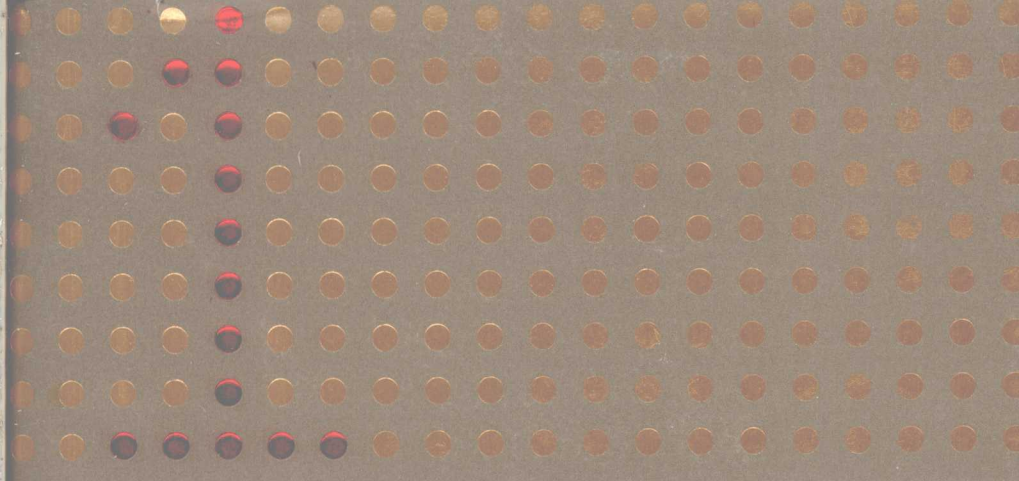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一集 文学理论卷一

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

本卷主编 陈思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一集. 文学理论卷一/陈思和主编,
王进编选.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321-3543-1

I. 中… II. ①陈… ②王…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文学理论-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4421 号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 1976—2000

In 30 Volumes

VOLUME I : LITERARY CRITICISM—Part I

Editor-In- Chief: Chen Sihe

Assistant Editor: Wang Jin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

Shanghai, China

本丛书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出品人 郑宗培

责任编辑 吕晨

封面设计 袁银昌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一集

文学理论卷一

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

本卷主编 陈思和 编选 王进

编辑: 本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绍兴路 74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5 插页 6 字数 593,000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册

ISBN 978-7-5321-3543-1/I · 2701

定价: 59.00 元

出版说明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优秀成果的作品总集，是中国出版界几代出版人延续了七十余年努力编纂的一项系统工程。第一辑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由出版家赵家璧主编，请胡适（建设理论集）、郑振铎（文学论争集）、茅盾、鲁迅、郑伯奇（小说集）、周作人、郁达夫（散文集）、朱自清（诗集）、洪深（戏剧集）、阿英（史料·索引集）编选并撰写导言，蔡元培作总序，于1935年10月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本社于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除影印重版了第一辑外，在文坛耆宿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芦焚、艾青、于伶、夏衍、王瑶、康濯、沙汀、陈荒煤、洁泯、柯灵、廖沫沙、刘白羽、臧克家、陈白尘、张骏祥、冯牧、王蒙、袁鹰、罗竹风、徐迟、邹荻帆、谢冕、吴祖光、丁景唐等的支持和参与下，又继续编纂、出版了第二辑（1927—1937）、第三辑（1937—1949）和第四辑（1949—1976），各二十册。至此，从“五四”到1976年“文革”结束六十年间的中国新文学优秀篇章，尽收在这七十册、四千五百万字的四辑《大系》之中了。

本辑《中国新文学大系》为第五辑（1976—2000），编纂工作由本书编辑委员会主持，王蒙、王元化担任总主编。分卷主编分别由陈思和（理论卷）、雷达（长篇小说卷）、孙颙（中篇小说卷）、李敬泽（短篇小说卷）、江曾培（微型小说卷）、吴泰昌（散文卷）、朱铁志（杂文卷）、李辉（纪实文学卷）、谢冕（诗卷）、秦文君（儿童文学卷）、沙叶新（戏剧卷）、吴贻弓（影视文学卷）、杨扬（史料·索引卷一）、郑宗培（史料·索引卷二）担任。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选文时限二十五年，基本涵盖了整个“新时期文学”。在经历了十年文学凋零时期后，中国新文学重新走上了一

条康庄大道,各种门类的文学创作硕果累累。为了全面反映这二十五年新文学的创作业绩,本辑《大系》增加了微型小说和儿童文学两个门类,篇幅也增加到三十册,总字数约二千万字。

入选作品,一仍前例,原则上采用首次发表和初次出版的版本,文中除错别字外,不作任何改动。文末注明出处。

这一时期发表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作家的新文学作品,一并列选。但由于资料条件的限制,难以收选得如大陆作品一样详尽。入选的作品,分类编排于各分卷之中,不另立册。

篇目排列,理论卷、儿童文学卷和史料·索引卷按专题分类排列,同一专题下以文章发表或出版先后为序;其他分卷均以作品发表或出版先后为序,同一作者有多篇作品入选,其篇目按时间先后排列一处。

对在本辑《大系》编纂过程中,给予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作者及其家属和有关出版单位,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

总 序 一

王蒙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这是第五辑了，从赵家璧先生于七十五年前在良友图书公司主编出版了第一辑《中国新文学大系》以来，上海文艺出版社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一代一代，前后编了七十五年，五辑百卷。百卷沧桑，百卷心事，百卷才具，百卷风流。呜呼，不亦盛哉！

本辑所选篇目出自 1976—2000 年。简单地说，从“文革”后到 20 世纪的结束。《班主任》《于无声处》《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芙蓉镇》《团泊洼的秋天》《鱼化石》《回答》《哥德巴赫猜想》《周总理，你在哪里？》……这些耳熟能详的篇目，以及一系列为“伤痕文学”鸣锣开道的理论文字仍然使我们激动，仍然使我们热泪盈眶。它们有一种类似时光隧道的功能，才一“触电”，立马接通，我们陡然回到了那个过往的年代：万众一心，充满期待，一片真诚，一腔块垒喷薄而出，涕泪交流，却又是美梦如霞，仍然不乏天真与一厢情愿。

当然，文学是我们的最生动、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我们的“心灵史”。有了文学，历史就难于抹杀，激情与思考将成为永远，怀念与记取充实着我们的灵魂，经验也诱人几分。而一切自我作古的宣告，都只能丢人现眼。

时间，是那个“后文革”的激情年代文学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学的当下性（还不止有当代性），使文学成为扭转乾坤，拨乱反正的一支力量，成为唤醒郁闷无奈的国人的一串春雷，文学带来的是希望，是振聋发聩，是从此摒弃极左面目出现的封建专制主义，是从今走向现代化，是走向民主、文明和富强的心愿洪潮。

《乔厂长上任记》《爱,是不能忘记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北方的河》《陈奂生上城》《哦,香雪》《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致橡树》《人到中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慢慢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走向了千家万户,共鸣于多少人的浮沉祸福,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不仅仅是一个“文革”呢,多灾多难而又奋斗卓绝的国人哟,且有的写,有的咀嚼,有的编织,有的哭也有的笑呢。

而《古船》《美食家》《隐形伴侣》《爸爸爸》《心灵史》《苍老的浮云》《动物凶猛》《无处告别》《受戒》《命若琴弦》《白色鸟》《叠纸鹞的三种方法》《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更是不断拓展着情感、题材、手法、想象力的新生面,文学变得多样化乃至陌生化了。

到了 90 年代,文学舞台上的活跃人物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贾平凹、莫言、王安忆、余华、铁凝、李锐、王朔、苏童、毕飞宇、毕淑敏、迟子建、方方、陈染、池莉、刘震云、海子、西川、林白、徐坤、何申、于坚等名字了。他们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此种说法在 60 年代是作为涣散离心的负面词语而流行的,现在用来形容文坛,其实很贴切,并且基本正面)。1949 年以来,甚至 1919 年“五四”以来,文学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活跃过、多姿多彩过,也从来没有这样难以概括、缺少聚拢性、缺少方向感,形不成主流、形不成“文学运动”,缺少公认的优秀高峰过。有时你甚至于难以从当下阅读中找到感觉,摸出路数,理出头绪。请看各种选刊,80 年代时选目是大同小异,后来则是大异小同。缺少例如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红岩》那种人人先睹为快、发行数百万册的主流正经文学作品了。

甚至,你也可以说,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堕落与无耻过。例如,写到了性与亚性器官、娼妓、吸毒与像有些作家说的,引起争议的所谓“辱骂自己的母亲”。

所以至今仍然不止一个人认定现在的文学创作不如提供出了从《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到“三红两闯”(《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李自成》)的年代。然而,你当真找来过往的名著与今天的创作对照着阅读,你又不能不承认,是今天,人们写得更深沉也更多样,更风格也更个性,更耐读也更艺术,更人性也更动情,更富有想象力与幽默感,

更富有选择与珍藏的可能性。

前前后后出现了对于解放思想、人道主义、文学史重写、新启蒙、文学的主体性等问题的热烈争鸣与文学争论的政治背景、政治敏感性。出现了对于现代派“狼来了”的惊呼。出现了对于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的碰撞……还有什么朦胧诗、新写实、痞子文学、中国作家是不是自杀得太少，直到作协与文坛的评估等众说纷纭的话题与对于整顿和政治干预的呼唤。也出现了一串篇目，例如《苦恋》等“有问题”的作品和一些作家的异议化、出走化与逐渐回归的过程。

这二十多年的文学像大河，先是奔流而下，波涛汹涌，势不可挡。而后越冲越宽阔，岩壁坍塌，轰轰隆隆，高高低低，跌跌撞撞，泡沫、枯草、败叶、泥浆打湿了你的衣襟。浪花、光影、鸥鸟吸引着你的目光。越来越多的歧议忽隐忽显。这个时期的文学又像山峰，时而连绵不断，群雄并起，时而异石削壁，似梦似幻，时而陷阱洞穴，险象丛生。文学又像晚会，时而喝彩欢呼，吹捧有加；时而平常淡漠，随看随忘；时而啧有烦言，难调众口；时而高论入云，不着边际；时而平庸散漫，自生自灭。尤其进入 90 年代的市场经济生活的背景，使文学似乎越来越缺少高潮了，缺少振聋发聩、精神火炬，看起来似乎越来越没有聚拢性、煽情性、精神领袖性与“大师”的弥赛亚（救星）——旗帜性了。一种说法乃在国内直到国外流传开来，说是中国的文学没有成果了，退潮了，恶劣化了，完蛋了。^①

其实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是日益正常了。开阔、开放、宽容、创作自由都会付出并不太少的代价。好的和差的，深刻的与浅薄的，独到的和迎合的，真诚的与虚伪的都日益正常——正常的年代总是有好有坏，有真有伪，有毒素也有营养；当然同样正常的是有对于假冒伪劣毒的揭露、批评与义愤，虽然这种批评义愤是否时有夸张或时有软弱无力还有待分辨撕扯。

有趣的是，20 世纪后几年的作品中，时间因素，已经没有当初那么

① 不仅我的友人与译者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严厉批评，说当代文学是“垃圾”。2008 年笔者访问德国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议院的议长拉默特先生会见我时提出：希望中国文学继续或更加关注社会与人民。

重大了,甚至是越来越平常化、平淡化了。平常心三个带有佛心禅意的汉字现在变得大行其道。文学是当下的,又是历史的与将来的。文学是时间的又是超时间或者淡化了时间的。当紧迫的心情平稳下来,当人们在追求正义、美德、真诚、雄辩与勇敢的同时,有可能寻求怀念与遐想、趣味与玄思、亲和与纪念、快乐与有价值的悲伤、隐蔽与新奇……的时候,当人们的当下性,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主要不是靠文学来加油或者体认,当心中的块垒表达抒发的渠道愈益多样,当人民群众的思虑更多的是向现实、向经济生活、向利益倾斜的时候,当人们面向着现实、实用,而现实生活已经紧紧地与经济与市场与利益得失结合起来了的时候,文学,至少越来越多的精英意识比较强的文学构成渐渐走向精神世界的或内里、或高端、或朦胧、或妙悟、或边缘、或超前……反正是不完全是那么急功近利的地带了。

与此同时,市场化的畅销与惊人的效益也成为一部分写家的追求。这引起了社会与同行的不同反应,有的痛心疾首,有的从容看待,有的狗血喷头,有的我行我素,有的见风使舵,有的连蒙带唬,有的兼顾几头,弄潮于穿行于思潮起伏、主流价值、社会变化与市场行情的风口浪尖。

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学的非凡高潮往往和社会的郁积与历史的风暴联系在一起,和怒吼与泣血联系在一起。而相对平稳的文学的积累与拓展,文化的积累与变革,则更富于渐进性与细无声的润物性。沉迷于昨天的高潮的同道,难以掩饰自己的失望。有几个精英意识比较强的写作人同行好友,痛骂世人的庸俗市侩侏儒化,我们可以假定这样的批评与提醒是适时的与正确的,但是你有时须要以平常心面对渐渐非高潮化的社会,非高潮化的文学,你有时须要懂得天道有常,与时俱化,经济建设、民生、市场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形成自高潮化到正常化的移动。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几个精英或准精英的凶狠抱怨,无助于掀起中国当代文学的新高潮。

还有另一面,叫做于无声处听惊雷,叫做起于青萍之末,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从理论上分析,而如今的一些愤青式或老愤青式的呐喊,或嫌苍白、贫乏、嘶哑与自己重复自己。

同样,以下的事实也无法视而不见:叫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奶粉

里有三聚氰胺,文学里自然有——难免有,虽然我们都希望没有:下三滥与纨绔牛皮同在;装腔作势,装时尚、装白领、装洋化与装冬烘传统同在;迎合与无定向横炮同在;口水表演与假冒伪劣同在。大骂文坛,大骂作家未能成为鲁迅第二或诺贝尔得主(也不是第一)或喋血烈士的声浪是合乎时宜而且蛮安全的,虽然类似的说法其实太廉价——源于无知。

我们感谢时间对于真正的文学的帮助。时间是文学的慈母,众说纷纭也好,良莠不齐也好,经过了三十余年的洗礼,时间仍然偏爱已经被认真阅读过并且仍然值得重读或新读的许多作品。同时严格的,道是有情却无情、同时是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时间法官无情地掂量着昨天:某些红极一时、人为地被哄抬起来的作品或理论文字现今已经难于卒读。悄无声息的、被“文坛”的主导者忽视了一些作品因时间因素的淡出、急功近利的文学观的削弱而光彩照人,毕竟非文学的因素会被时间的水流所冲刷,耐心与静谧的阅读终会取代敏感的一时性因素的干扰。时间的法官同样会有差池,但是更长的时间的回旋与淘洗常常能自行纠正自己的过失,时间的因素同样能制造假象,但是更长的时间的反复与不舍昼夜的思量,定能使文学自行显露真容。

我们与时间同行,我们因时间而聪明而明白而丰富并且宽容。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们因时间而识破了许多肤浅乃至假象。我们因时间而做出应有的选择。经过千挑万选,经过多方衡量,当然还有待于作者的信任与授权,依靠各卷主编与编辑工作人员的努力,我们深情地捧出了这三十卷近两千万言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请读者明察,请时间的大河、请文学史考验我们的编选。^①

2008年11月2日

① 本辑还编选了这一时期介绍到大陆来的香港、台湾同行的作品,这一工作在此时间段还刚刚开始,难以从中理出港澳台文学发展的轨迹,但是这些作品的编入,当能提高阅读的趣味与开拓我们的眼界,我们感谢港台作家的授权,使本辑大系平添异彩。

总 序 二

王元化

一、我的祝辞

21 世纪已经过去七年了,现在回过头来,回顾“文革”后到 20 世纪末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文学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多变化、发展。可以说,这二十多年是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它作为一个时代,本身也引起了众多文学爱好者、研究者的关注。从这个层面上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的意义是相当深远的。那么多在文学领域内很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聚在一起,共同来重现那个时代的面貌,留下那个时代的痕迹,为后人保存一份珍贵的史料,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我相信,无论是文学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很希望有这样一套书能够问世。现在很多高校都有“当代文学研究”的课程,《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将会成为一套相当重要的教材。

从“文革”结束到 20 世纪末的这段时期,至少在我个人看来,是很让人留恋的。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开始兴旺起来,文学也是如此。尤其经过了“文革”,十年的动乱已经让文化变得很枯寂、很沉默了,却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散发出许多耀眼的光芒,让人感觉很惊喜,也很激动。这个时期的文学在各个方面,包括思想内容、文学技巧等等,都有很多新的东西,所以有许多很值得留在历史文献中的内容。

我原本也是从事文学工作的,能够担任这套书的总主编之一,自然觉得非常荣幸。不过因为年纪和身体的原因,我能在这套书做的事情并不多,很感抱歉,具体的编选工作还需要仰仗各位与会专家的智慧。不过我也会尽我的能力,向大家真诚地提供我的意见。

二、关于编选工作的几点建议

1. 敏感作家、作品的入选问题

这是个比较棘手的难题,有些事情必须要考虑周全。另外有些敏感问题,需要慎重。

我个人的意见是,这些作家、作品是作为历史事实摆在那儿的,而展现历史则要尽量做到完整。我们可以在前言或凡例中强调《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历史文献性,说明它主要是作为文献资料存在的,不管作者是什么人,都作为历史原貌收录进来,并不代表我们赞成或者推荐他的东西,而是留给以后的文学研究者,为他们提供研究、检索上的便利。不仅仅设立单独的“史料·索引卷”,而是整套书都作为文献资料。我们的立场可以主动一点,凡例订得详细清楚一点,把凡例也送上上级部门审批。

2. 是否要设“影视文学卷”

这段时期的影视作品还是有一点好东西的,所以应该尽量保留。毕竟电影电视对当代人的影响是很大的。虽然 80 年代的电影很多是由小说改编的,重复的很多,不过重复之外应该还会有一些好的作品,比如已故的张弦的几个本子。如果实在是因为难度大而不设“影视文学”,至少要在凡例中有一些交待,因为既然称为“文学大系”,这部分内容是不能被忽略的。这个问题,最好再听听电影界人士的意见。

另外,有必要在“理论卷”里收录一些重要的、产生过影响的影评。

3. 关于传记文学

80 年代初,传记文学开始起步,出了不少作品,似乎也不容忽视,是不是需要编入?或者可以在“理论卷”里有所反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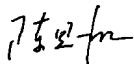
4. 选家的个性和历史评价的协调

希望主编不要过于发挥自己的个性,而是应该尽量从文学史的角度

度出发,尊重文学史上的评价,以历史文献的眼光进行编选,而不是代表个人的观点。当然,也可以保留一点个性,在前言里进行评价的时候可以带上个人的色彩,但是选作品的时候不能太主观了,因为这毕竟是历史文献性的东西,要有一份公允心。

2007年5月21日

此系王元化先生生前为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7年5月22—23日在杭州金溪山庄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分卷主编第一次会议所作的书面发言,代为总序。本书编辑委员会谨在此为王元化先生于2008年5月9日不幸病故而致以深深悼念!

序 言^{*}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文学理论卷》共分三卷,第一卷为人文的复兴,第二卷为思潮与争鸣,第三卷为作家作品论。我们四人为一个工作小组,由王进负责第一卷的文章编选,金理负责第二卷的文章编选,谢有顺负责第三卷的文章编选。我作为项目的负责人,主要工作就是制定每卷的编选提纲,协调各人的工作进度以及审定最后的项目成果。应该说明,参与文学理论卷编选工作的王进、金理和谢有顺,都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在各自研究领域里都有出色的表现。对于这项编选工作,他们都非常认真地投入阅读、思考和讨论,最终选出他们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大系”。我充分尊重他们的见识和劳动,只是作为近三十年文学的过来人向他们提供了若干建议,做过些微调整。总的来说,这三卷《大系》是三位年轻学者努力工作的结果。

我通读了他们的编选文章和为此撰写的说明内容,基本同意他们对这一段文学史的描述和理解。他们都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对文学和历史都有他们自己的理解方法。文学本来就是通过对未来的影响来呈现其意义的,文学在未来保留的时间越是长久,在未来的阐释越是复杂多样,文学的魅力也就越是显现出来。我特意请了这几位年轻人来参

* 本序言是由《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的四位编选者(陈思和、王进、金理、谢有顺)集体完成的,其中第一部分是陈思和根据王进的初稿改写而成,第二部分是根据金理的初稿略作修改,其他部分为陈思和所写。全文由四人集体审阅通过,陈思和为最后定稿者。

与这项工作,就是为了见证经历了三十年的“文革”后文学,到底还有多少魅力可以被呈现出来。我是 1977 年恢复高考以后开始成长起来的,我对这三十年的文学发展的见证,是同步性的,而他们对于这段文学史材料的梳理则是后起的,我们用双重的编选眼光来总结这段文学史,它的客观意义多少可以被立体地展示出来。我们面对文学史,说某某作品或者文学现象在当时产生过积极的意义,这其实并不重要,也不值得去顶礼膜拜,而重要的是,这些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在今天的研究者和读者眼里,是否仍然有它的存在价值和理由。

1935 年,当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编辑策划新文学头一个十年的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时,策划者把理论建设和文学论争分为两大卷,分别邀请胡适和郑振铎编选。从今天来看,这两卷大系的内容是分不开的。五四新文学本身是以运动的形式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理论是新文学的开路先锋,筚路蓝缕的建设过程也是金鼓齐鸣的论争过程。当时的文学论争,不像后来的 1930 年代的宗派之争和 1940 年代的政党之争,而是完完全全的新思维、新理论和新观念的开拓,它是通过对旧的传统思维方法、文学理论和文化观念的批判来展现自身的。理论建设本身就是文学论争,所以这些理论在当时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已经溢出了思想文化领域,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走向。这种理论先行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并非绝无仅有的现象。后来有两个历史时期在形式上又重复了这样的情况:一次是 1949 年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用毛泽东发表于 1942 年战时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作全国文学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来改造文学创作的整体面貌,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进行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实践。还有一次就是 1978 年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上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首先是在思想领域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紧接着,文学创作根据实际的生活感受,写出了直面人生的“伤痕文学”,文学理论紧紧伴随着文学创作,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一步一步地推动文学创作。统治了中国几十年的极“左”的政治路线和教条的思想方法终于受到认真的挑战。文学理论又一次充当了思想冲突的晴雨表,每

进一步都是争论,以及由争论引出的代价。但是文学、思想、社会生活就这样不可阻挡地发生了巨大变化。直到文学艺术彻底完成它在非自身领域里客串的功能,已经是1990年代,一个苦难而伟大的世纪也行将结束了。

所以,我接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文学理论卷》的工作时,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九十年前发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我坚持要把周扬发表于1979年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放入文学理论卷的头一辑,当时是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现在已经在纪念五四九十年周年了,回顾这九十年的文学道路,大致正如周扬所归纳的,三个历史阶段,三次思想解放。但每一次的思想先行的含义并不一样:第一次是知识分子刚刚离开传统的庙堂,开辟了一个知识分子面对民众、表达新思想的启蒙广场,他们攻击的对象是已经在崩溃中证明无力担当历史进程的传统文化,他们所向披靡;第二次是国家刚刚建立新的政权,在百废待兴之际用战争经验来建设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它扫荡的是一切被认为不利于新政权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文化,当然,它也所向披靡。而第三次却不是这样的,它是处于国家和执政党刚刚经历了一场自身内部顽疾所致的灾难性浩劫,正在投石问路,自我清算,企图通过实践来摸索一条走向未来之路,既能拯救国家民族于灾难危亡,又要证明执政党具有的自我克服、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积极创新的思想路线和亟需纠正的思想路线同时存在于执政党内,没有现成的新思想,一切都需要在实践的检验、思想的冲突和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也没有所向披靡的交锋,整个论争过程都是在进两步退一步,或者进一步退两步的反复磨合中慢慢地摸着石子过河。今天,我们要用既成的历史文献来再现这样的复杂过程,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但是到了19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特意把关于人文精神寻思的材料移到这一卷的最后部分,除了时间上它发生比较晚以外,从性质上说,这一场争论终于摆脱了1980年代的怪圈,成为知识分子和作家自发的关于未来精神走向的表述,理论的落脚点似乎回到了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五四的余响仿佛又微弱地出现了。学界在评论“文革”后文学时,总是难以判断1990年代的文学,我曾经把它描述成一种无名的文化状态,与1980年代的

共名文化状态作了对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与国家意识形态共谋了时代的共名,如五四、大革命、抗战、建国,等等,唯有1930年代前期在全国范围有过一次短暂的无名状态,直到1990年代,真正的无名文化状态才出现,共名开始被消解,再也没有拢住一切的时代主题和共同标准,文学按照多元走向发展变化。^①这个时候,企图涵盖一切文学实践、指导一切文学创作的理论也不复存在了。

一、人文的复兴： 为人道主义辩护·文学主体性·寻思“人文精神”

第一卷偏重于基础理论的建设和发展,编选原则是这样一条思路——以人文的复兴为主线,抓住两个关键词:1980年代“文学主体性”的理论争论和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的寻思,然而,当这一人文的精神指归慢慢成为当代文论主题词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是1980年代前期思想解放运动所推动的有关人道主义的争执与辩护,其为以后的人文复兴铺平了道路。——我这里用了“铺平道路”一词,是来自我内心的隐痛,确确实实,在那二十五年的文学理论的思潮演变中,为了取得近似常识的一点点进步,许多文学理论家不得不充当了铺路的石子,他们被压碎了自己,换来了未来道路的平坦。然而,我还必须强调的是,即使人文精神在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复兴经历了艰难考验,但它并不是作为某种外在的异质因素注入当代文论的,相反,人文的当代复兴最初是依仗了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教训中的自我转化,当1978年理论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这种自我转化就显示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郁达夫在主编第一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里有个著名的论断:“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

^① 关于“共名”、“无名”的探讨,参见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第三章“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文化状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

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①这个论断可以说是贯穿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根理论主线,从五四初期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到 1950 年代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再到 1980 年代刘再复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表述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其理论核心是一致的,就是把文学放在人的实践、人的认知以及人的价值的平台上加以考量,使文学与人学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建构当代文学内在的价值标准和精神尺度。但是,文学理论要从传统教条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阴影下摆脱出来,恢复文学是人学的精神内核,绝非轻而易举可以完成。我们看到,当时文学创作领域已经出现了直逼人的精神伤痛的伤痕文学思潮,但是文学理论却严重地滞后——理论家们还在传统的“什么是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在哪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倾向性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悲剧”等等繁琐概念里兜圈子,理论不敢正视和解说生活中已经大量存在的人的血肉灾难,不敢正视和分析文学作品中已经描写出来的人的精神悲剧,不敢直面人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就说明这样的文学理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要激活它而不是简单地抛弃它,没有别的办法,必须注入人的生命活力,只有活生生的血肉之人而不是虚构观念中的所谓“典型”作为理论所关注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意义才会真正发挥出作用,完成理论生命的自我更新。

这是 1980 年代初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的背景。这场讨论的主体是一批在中共党内有很深资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目睹了极左路线是怎样长期戕害党内民主,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是如何逐渐形成并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建设,长期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什么能取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解。这样一些问题加上痛定思痛的“文革”背景,“人”的问题又重新回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域之中。代表作就是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

^① 赵家璧主编,郁达夫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部分第 5 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版。